

读史与畏史

俞晓群

明代吕坤,面对当时书籍混乱的现象,将图书分为九类:全书、要书、赘书、经世之书、益人之书、无用之书、病道之书、杂道之书、和败俗之书。其中“全书”只有两部:《十三经注疏》与《二十一史》,列为群书之首。本文按下经书不表,先说史书的故事。

在经史子集中,史书登堂入室,始见于三国刘备与孙权的两段故事。刘备去世前,给儿子刘禅留下遗言,其中包括一个书单,有《汉书》;孙权与大将吕蒙等人,谈自己的读书经历,也列出一个书单,包括“三史”。章炳麟先生说:“自是通史致用,遂为通则。”

在先儒的观念中,读史有多重要呢?我们接着听章先生的观点:“人不习史,端者不过为乡里善人,庸者则务在衣食室家,而尚奇者或为乱政之魁,清末至今,其弊可见。”章先生这段话说得很有分量,但并非独家之见。如明末清初魏禧,曾在《里言》中写道:“人不可不读史,未读时,觉自己尽高,七尺之躯昂然独上。及见前代人物,忽不覺矮極極了,大地之宽,竟毫无立足之地。”

他们为什么把读史一事,说得如此重要呢?魏禧举例说,比如先人有“读书使人心粗”之句,其实它的病根不是读书的错,而是在与读史或读史不精的错。魏禧在《与彭中叔》中写道:“先儒云:读书使人心粗,如云过独木桥易使跌;是要人细心读史之意,非谓桥梁不须过。后人误认此语,有志道学者,只看性理语录,史书置之高阁;即

或涉猎,几等稗官小说而已。”接着魏禧又以宋代伊川(程颐)读史为例:“伊川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其成败,然后再看;有不合处,又更思之。其间有幸而成,不幸而败者,不独徇其已然之迹与众人之论。此正是怕心粗处。”

读史既然重要,因此历代留下许多苦读史书的故事。帝王读史如高宗,有记执政徐俯,曾劝高宗读《光武帝纪》。有一天,高宗将抄写好的《光武帝纪》送给徐俯,并说道:“卿劝朕读光武帝,朕思读十遍,不如写一遍。今以赐卿。”诫子读史如曾国藩,他在家中告诫儿子,谈《汉书》,要准备不受困于精粗之说,每日必须看20页,切不可今日半页,明日数页云云。“如煮饭然,歇火则冷,小火则不熟,须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更夸张的读史,有见于明代陈继儒《读书十六观》记载,宋代苏舜钦夜读《汉书·张良传》,要准备一斗酒,“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抚掌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饮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

读史更刻苦的人,还要首推苏轼。有人问苏轼:“先生博学广识,我们可以做到吗?”苏轼说,可以啊,我读《汉书》,要读很多遍才能完成。比如治道、人物、地理、管制、兵法、货财之类,每读一遍,针对一件事情,几遍之后,就会事事清楚了。所谓“叁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

《晋旧闻》中,记载苏轼读史:“东坡读《汉书》,日课手抄《汉书》,自言读《汉书》凡三抄: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标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朱司农载上谒坡,乞观其书,坡云:‘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

前述先贤讲读史,其中多有涉及方法之论。因为史书篇幅浩繁,路径崎岖,读者难进难出,因此研读史书的方法至为重要,对此历代先儒表述极多。此处略举六段:

其一,读史要全面观照,不可专于一家。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说》强调,读史不可“习于太史者,偏妒孟坚……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犹武陵险士,灾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巢穴之地。”对此,清代浦起龙按语:“此条谓读书不可偏泥一家,局护偏遗,亦一病。”

其二,读史要有条理性,宋代俞成《萤雪丛说》写道:“历事几大? 历任几官? 有何建立? 有何献明? 何长可录? 何短可戒? 传中有何佳对? 此贾挺才先生史记法也。”宋代王楙《野客丛书》写道:“凡读史,每看一传,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义,或才德,大节无亏。人品既定,然后看一传文字如何? 全篇文体既已了然,然后采摘人事可为何用? 奇词妙语,可以佐笔端者记之。如此读史,庶不空遮眼也。若于此数者之中,只作一事功夫,恐未为善耳。”

其三,读史要循序渐进,元代

许衡《性理大全》写道:“阅史必且专于一家,其余悉屏去。候阅一史毕,历历默记,然后别取一史而阅之。如此有常,不数年诸史可以备记。苟阅一史未了,杂以他史,纷然交错于前,则皓首不能通一史矣。”

其四,读史要尊重史书记载,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写道:“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年经事纬,一部居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剖析无疑,而若者可褒可贬,听诸天下为公论焉可矣。”

其五,读史与读经,有何异同,谁先谁后呢? 清代张潮《幽梦影》写道:“经传宜独坐读,史鉴宜与友共读……先读经,后读史,则论事不谬于圣贤;既读史,复读经,则观书不徒为章句。”

其六,读史不可玩物丧志,清代王夫之《俟解》写道:“读史必博文之事,而程子斥谢上蔡为玩物丧志,所恶于丧志者,玩也。玩者,喜而弄之之谓。如《史记·项羽本纪》及《史记·荆轲刺秦王》,淋漓痛快,读者恋恋不舍,则有代为悲喜,神飞魂荡而不自持。于斯时也,其素志尚者,不知何往,此之谓丧志。以其志气横发,无益于身心也。岂独读史为然哉!”

谈读史方法,由此及彼,似可通论,但亦有司马迁《史记》不同,其地位崇高,不可泛泛而论。更多先人,

并未将其单纯当史书来读,如清代冯班《钝吟杂录》所言:“今人读《史记》,只是读太史公集耳,不曾读史。”对此本文略举三例:一是唐代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谈道,书籍可以分为取道与参悟两类,柳氏将《史记》归于后者,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柳氏还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谈写作,再称“毅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二是宋代徐积,读《史记·货殖列传》,见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一句,于是悟到作文之法。三是清代黄本骥,在《读文笔记》中写道:“《项羽本纪》是史公极得意文字,班婕妤采入《汉书》,省去2683字。《史记》多字处有多字之妙,《汉书》少字处有少字之妙:多者逸,少者道。”

中国数千年,帝王将相,素有喜好读史的传统。前文提到刘备、孙权及宋高宗即是。还有石勒故事,《晋书·石勒载记》有记,石勒不知书,却喜欢让别人给他诵读《汉书》,听到厨食其功刘邦立六国,石勒惊呼失策,如此还能得天下吗? 听到张良谏止,石勒才舒了一口气。梁元帝萧绎是一个异数,他读书极多且有高见,如在《金楼子》中说:“正史既见成得失,此经国之所急。五经之外,应以正史为先。”但他本人却治国无方。遭到魏军围城时,“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足见其书之多。《南史》评价萧绎:“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适足以益其骄矜,增其祸患,何补金陵之覆没,何救江陵之灭亡哉!”

一座村庄的温暖记忆

江少宾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国家,农耕文明是最主要的文明形态。然而,当高速公路、摩天大楼、互联网以摧枯拉朽的速度瓦解农耕文明时,我们的故乡次第在沦陷,和故乡有关的种种物事也从我们的记忆中逐渐退场。可以预见的是,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浇铸了一代人的集体乡愁,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文化基因,以及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

最近,我翻看了酸枣小孩的散文集《从前,有个王村》(以下简称《王村》)。这是一本记录风土人情、关注人物命运、传达生命体验的书。作为“原风景”丛书之一,《王村》有着显而易见的写作志向,即记录中原大地上的一座即将消失的村庄,并借此为中原大地乃至乡土中

国立档。正如作者在《跋:梦里不知身是客》中所写的那样:“我想象不出,多年之后的王村会是怎样的。是被一个崭新的乡村所替代,还是在日渐凋敝之后最终被变成城市人的村民所遗弃。”这里的“王村”,已经不仅仅是作者离开后又在纸上频繁回望的那个王村了,而是一个一代人共同的精神故乡。似乎可以这样说,作者呈现给我们的“王村”,既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情感家园,也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社会符号。我无意抬高作者的乡村书写,但她也确实有备而来——面对王村,她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怀旧人,只准备贩卖一些廉价的情感记忆,而是一个亲历者和介入者,她既没有丑化王村,也没有美化人物,更无乌托邦似的高蹈的抒情。

修辞立其诚。她是揣着一颗诚心,陪我们回到那个久违的有温度的王村——熟悉的菜蔬、昆虫、草木、古风……多么熟悉的童年,精纵即逝的闲愁与苦痛,“梦里不知身是客。”行旅中中断续续读《王村》,我和皖江北岸的故乡有了一次重逢。

《王村》共分七辑,《食蔬记》《知味记》《古风记》《昆虫记》《草木记》《故物记》《旧事记》,每一篇都不长,1000多字,2000多字,3000多字,其中诸多篇章,我是在辗转的行旅途中,见缝插针一样抽空读完的。这七辑,有的状物绘景,有的叙事写人,难得的是行文竟一脉相承,朴实,亲切,如话家常,像汪曾祺的某些随笔,读时只觉是闲趣,回过头来细想,分明又是人生的大智慧。事实上,《王村》也确实是一本智慧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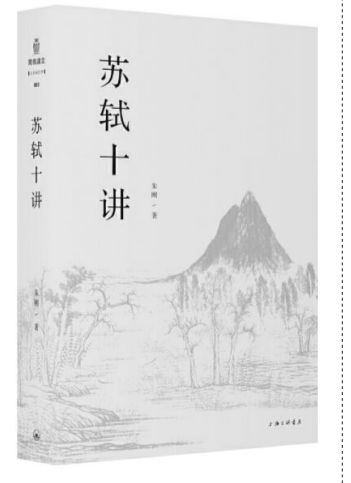
酸枣小孩有一股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

我没有见过酸枣小孩,只知道她对文学有一股异乎寻常的热情。酸枣小孩下笔不浮华、不矫情、不虚饰,甚至很少动用修辞。无论是那些辛酸的童年往事,还是那些早逝的生命个体,作者呈现出来的,都是一段“从前慢”的温暖记忆——温暖,是《王村》的底色,《王村》,就是一段温暖的乡村回忆。作者以直接而又真诚、深情而又温暖的书写,使《王村》获得了另外一层意义——它不再是一本唯美的乡村散文集,而是一本乡村精神的守望之书。在作者娓娓道来的诉说中,我们的童年记忆被唤醒了。田园将芜,胡不归?《王村》伴我们纸上还乡——尽管我们的故乡已空荡荡的,炊烟不再升起。

在雪泥鸿爪中串起苏轼的人生起伏

张永涛

提示 苏轼可谓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苏轼十讲》以十个主题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苏轼置于历史与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在作品与文献中捭阖出入,并作精妙讲解,一部披沙拣金的“苏轼新传”赫然可见。古人常用“读书得间”形容从字里行间读出真意、新意乃至象外之意的阅读状态,听来轻松却不易达成。苏轼教人读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一路全原本、熟读精思、反复涵咏、切己体察的法门,就是今天的“文本细读”,可谓今人“文本细读”的“得间”之作。



苏轼作品存世量极大,有诗2700余首、词300余首、文章4800余篇,围绕其人其世其诗其文的资料更多,要想避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进而识得苏轼“真面目”,舍“文本细读”,别无他途。上海三联书店近日出版《苏轼十讲》一书,由作者朱刚在复旦大学开设“苏轼精读”课程15年来的讲义集结而成。既是精研细读,其取径就绝非南辕北辙,以15年治一门课程,洵得“文本细读之要”,也足见治学的耐力和功力,其课其书能披沙拣金、纷披胜义的原因也在于此。

是书大致按照苏轼生平,联系时代,拈出雪泥鸿爪、贤良进卷、乌台诗案、三咏赤壁、庐山访禅、王苏关系、东坡居士的“家”、元祐党争、唱和《千秋岁》、个体诗史十个专题,聚集有关作品,知其人而论其文,赏其诗而见其人。这十个专题,都是有关苏轼生平出入进退、思想演进和文学创作的大关目,目所视闻,庶几可得“真面目”乎。同时,是书既是多年讲义集结,想来必曾回应过学生的关切,这种教学相长的互动,在成书出版后,也水到渠成地满足了读者的预期。而且据讲义以成书,其门槛必然不像学术专著那么高,读来可谓“即之也温”,但这并不意味着是通俗读本,因着大学讲义的来源,此书实是一部专题进阶版苏轼传记,更适合对传主其人其世其诗其文有一定了解的读者。

苏轼在作品中常以“鸿”这一意象自喻,这是老生常谈,但把若干“鸿”辑辑在一起进行分析,就见得“文本细读”的功力了。在第一讲“雪泥鸿爪”里,作者展示了四只鸿。对于“人生到处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作者说道:“太渺小的个体不由自主地

飘荡在太大的空间之中,所到之处都是偶然。”对于“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作者说道:“他原来以‘鸿’自喻,是因为必须随朝廷差遣而转徙,不能自主,感到被动不安;但此时被朝廷抛弃了,不再转徙了,却又觉得孤怀寂寞,有不被理解的苦,所以这‘孤鸿’仍是精神中遭流落的象喻。不过,‘拣尽寒枝不肯栖’,情感停在寂寞的沙洲上,表明这只‘孤鸿’对自己的栖身之地有所选择。有选择就是一种主体意识,与完全被动的随风飘流之鸿有所不同。”这不能不说是贬谪的打击唤醒了苏轼对主体性的自觉,大抵抵居的时候对‘自我’的关心总比身任要职时期更多。”对于“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作者说道:“这里写的‘秋鸿’,有了候鸟的另一种属性。在‘雪泥鸿爪’里,那个‘鸿’只是迁徙飘零,不知道会去哪里;而这个‘秋鸿’是会回来的,一年一度到相同的地方。所以,作为候鸟的鸿,春去秋来其实是有规律的,其境遇并非完全偶然。或者说,偶然性并不来自鸿本身,而是来自外力的迫使。人也是如此,自由之身可以以喜爱的环境反复温存,听命于朝廷的仕宦生涯四处漂泊。”对于“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次韵法芝举旧诗》),作者说道:“这是苏轼留下的最后几首诗之一,其诗意颇堪看作他对人生思考的总结。首句‘归鸿’,是早年‘雪泥鸿爪’之喻的再现,但喻义已大不相同,因为这次不是随风飘零的‘鸿’,而是‘归鸿’,虽经飘零,毕竟总会归来……”

当然,金无足赤,是书有一或可商榷之处。第九讲“唱和《千秋岁》”,是以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一词引起包括苏轼在内的众多同道中人的唱和为引子,再拈出《明妃曲》、静照堂诗、颜乐亭、超然台、黄楼等多次唱和事件,意在呈现并探讨北宋文坛的公共性以及传播媒介的更新进步,这样的内容,在课堂上拓展知识边界、启发学生思路是极好的,但作为一部苏轼的专书出版时,却多少显得枝枝蔓蔓,而且以一讲的篇幅处理如此一个大课题,实在是勉为其难。

受“文本细读”启发,我们试以苏轼四子的名字来解读他的心路历程。长子迈生于嘉祐四年,苏轼22岁,丁母忧毕,返京等待朝廷授官,后又准备科考,年少成名,前程远大,心态想必是豪迈的;次子迥生于熙宁三年,苏轼33岁,任职殿中丞直史馆,前此四年内,父苏洵妻王弗亡故,弟弟苏辙又因议论新法忤王安石被遣出京,迥者,达也、及也,比起十年前来的豪迈,心态已见平和,但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却已有达及之念,恐怕更因时势使然;三子过,生于熙宁五年,苏轼35岁,已步弟后尘,因反对新法出判杭州,这个过字,不论是过犹不及还是过而改之,已是自悔自警的心态了;四子遁,生于元丰六年,苏轼46岁,因乌台诗案已贬居黄州5年,遁世、隐遁、遁逃,心态是极为消极的。总之,四个儿子“迥迥过遁”,从积极到平和到消极,足以展示苏轼从22岁到46岁的心路历程。四子的名字皆以“辶”为底,这一部本来就象征人在旅途,苏轼的人生之旅大抵如此,只不过50岁后随着朝局变化,被起用、被重用、被冷落被贬谪,经历了第二轮的“迥迥过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书单

对历史的叙述也是对未来的勾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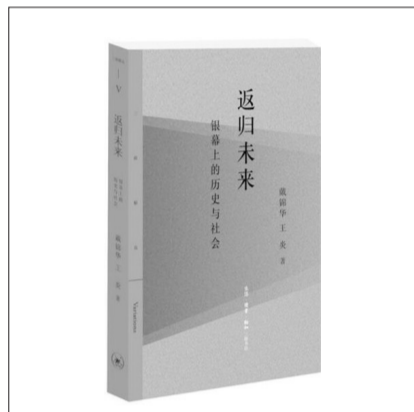
周末,去看李安的新片《双子杀手》。话说,看完这个120帧,蒙圈,很蒙圈,和看《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时的感觉一样。

我为李安担心。

就如毛尖所说:120帧的《双子杀手》,动作戏的确行云流水得不得了,但如果这是电影应对行业危机的策略,用李安自己的表达,“远离戏剧,用视觉讲故事”,那我打心底里觉得,电影是把自己降格为高清电竞,就像此片的一个广告是23岁的威尔·史密斯对阵51岁的威尔·史密斯,两人对飙摩托,视角自由切换,摩托车扔来扔去,但清晰度却带来非人感,流畅感更让力量贬值,这要是未来电影,那我“葛优躺”了。

2016年《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上映时,电影学者戴锦华就曾评价:电影已经越来越依赖技术、大数据、远离文化。本周书单的主打推荐是《返归未来》。是戴锦华和王笑岗围绕电影议题所作的七次深度对谈。本书的主题是电影,但不仅是电影。对话尝试去触碰的是老旧且常新的话题:电影与社会。或者说,是屏中现实与屏外的世界。电影的参数是记忆,与历史相对,与历史相关的记忆。电影,是二人思考的入口,但问题意识及诉求所在则是社会,是当下,是斑驳多端的现实。

此外,本周还有两本非虚构的新书,也值得你关注。



《返归未来》

本书通过鲜活犀利的思想碰撞与文字交锋,他们将个体记忆与银幕现实置于20世纪这一动荡多变的长历史流中,向读者揭示出作为一种特殊叙述语言的电影在“书写历史”与“呈现记忆”的过程中带来的谜题、反思、挑战以及希望。我们将看到,对历史的叙述也是对未来的勾勒,是打开未来想象的钥匙;最终,电影同我们一起不断返归未来。



《巨浪下的小学》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特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与核泄漏。这场大地震致使1.8万人遇难,有75个孩子在老师的看护下不幸身亡,但其中竟有74个孩子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大川小学。为什么在全境其他学校都获救的情况下,只有这个学校没有幸免于难? 英国记者哈里花费6年追踪调查,还原这场令人惨痛的灾难全过程,挖掘出日本秩序井然表象下暗藏的致命缺陷——海啸并不是问题所在,日本本身就是问题。



《用灵魂亲吻世界》

本书用温暖的文字记录了奥黛丽·赫本的一生。她出身贵族却饱受战争之苦,在颠沛流离中磨炼了一颗坚强的内心;她未曾拥有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却在晚年竭力为儿童慈善事业奔走,只想让每一个孩子绽放笑容;她在当时绝非主流审美,却凭自己时时尚独特的嗅觉,重新定义了美的内涵;她一生所求,唯爱而已,尽管有两次不如意婚姻,却始终相信爱的力量。她曾承受过伤害,却选择了保护他人;她曾历经磨难,却选择了在黑暗中追寻梦想的光明;她一生见过太多颠沛流离,却只记得最温暖的瞬间。她用他自己的灵魂温柔地亲吻世界,给人们带去爱意,这便是奥黛丽·赫本最深的优雅。